



Y1532453

分类号_____

密级_____

UDC_____

编号_____

華中師範大學

硕士学位论文

旧街花朝节庙会的发展与演变

学位申请人姓名: 戴雪纷

申请学位学生类别: 全日制硕士

申请学位专业方向: 中国近现代史

指导教师姓名: 严昌洪 教授



中文摘要

庙会是中国民间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庙会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旧街镇花朝节庙会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历经几百年的发展从未间断，成为当地及附近居民的一大重要物资交流市场。从旧街花朝节庙会八百年发展演变的历史，看庙会与乡村社会生活的互动，看非物质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旧街镇作为山区与平原交界处，靠近武汉、毗邻豫皖的独特条件为花朝节庙会在地兴起产生提供了便利的地域条件，传统的农业经济特点又促进了花朝节庙会的发展；当地花朝节与庆福寺庙会结合并不断演变，成为物资交流的盛会。

旧街花朝节庙会发展演变的历史，兴起于宋元时期，在明清时期得到传承，民国时期虽未中断但规模较小，解放后在政府引导下发展为花朝物资交流会，在改革开放后一度十分繁荣，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新洲区政府借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引导花朝物资交流会向花朝旅游文化旅游节转型。

探究旧街镇花朝节庙会长盛不衰的原因，有三个方面：多重功能是源泉，初期的花朝节庙会是旧街镇居民及附近群众宗教活动的一大场所，后演变为物资交流的平台，提供了人际交往的桥梁，成为娱乐大众的舞台，满足民众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的需求；民间与政府互动是保证，解放前花朝节庙会由当地乡绅与商贾的主导组织，广大民众的自发热情参与，解放后，政府对其发展进行不断的支持与引导，正是这多方面积极性的发挥，保证了花朝节庙会的发展；花朝节庙会自身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演进，其宗教功能的消退，世俗功能得以不断增强，并借助不失时机的转型，由花朝节庙会转型为物资交流会再转型为文化旅游节给它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旧街花朝节庙会对乡村社会生活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推动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乡镇经济由传统农业向农副业——工商业——旅游业的转型，活跃了平淡的乡村生活，和谐了人际关系，不仅如此，这一庙会在推动当地社会生活及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周边区域农村经济的发展。

旧街镇花朝节民俗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它与庙会物资交流这样的物质文化的结合，得以长盛不衰，这一事实告诉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起来后，还需要开发好，利用好它，传统文化只有与现实生活相结合才有生命力。在政府的宣传和引导下，花朝节在时代的演变中不断发展，充满生命力，使旧街镇花朝节庙会继续在区域的构建中发挥其经济及社会文化方面的作用。

关键词： 旧街 花朝节庙会 发展 演变



Abstract

The temple fair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ivil society life in China, the culture of temple fair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our traditional culture. It's a long and colorful history of temple fair of Jiu Street, several hundreds year' development has never stopped, and it become an important economical market of local residents and vicinity. This thesis analyz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emple fair and the social life of country and the great significance of the protect and use of intangible heritage from evolution of nearly eight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Jiu street.

Jiu street stand in the junction of the mountains and the plains of Wuhan, It is the special conditions which adjacent to the Henan and Anhui province supply the convince geographical factor for the rise of Flower Festival temple fai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econom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emple fair of Flower Festival. The evolution of the Flower Festival and the local Qingfu temple made the temple fair become a flourishing one of goods' exchange.

The Jiu Street's temple fair of Flower Festival rose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y, flourished in the period of Ming and Qing Dynasty.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 the scale of the temple fair of Flower Festival was smaller than before, after the liberation of China, it became a great exposi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government and flourishing again after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When the time stride forward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local government of Xinzhou borough guide transformation relying on the policy of " Cultural Stage, economic singing", which transform the economical exposition to the tourism area.

There are three causes of the flourishing of the temple fair of Flower Festival. First, it has multi-function. The originally period of the temple fair of Flower Festival is a great religious concourse for the local residents and vicinity. As the time went by, it became a stage of goods' exchange and entertainment for people, it also provided a necessary hyphen between the people's intercourse and meet civil demands for materials and spirits life. Second, it's pledge i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ivil society and government. It is the main organization of the local squires and merchants, people joined in it with spontaneous enthusiasm. After China's liberation, the local government supported and guided its development continuously. That enthusiasm of many sides promised the develop of Flower Festival's temple fair. Third, it has the persistent vigor from the transformation which made it transform the economical exposition to the tourism area in the right chance. The religious function was decrease and the unreligious function was increase in the evolution of itself.



The Jiu Street's temple fair of Flower Festival influence the rural life in many ways. It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handicraft industr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ownship which from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to the complex economy style include agricultural, commerce and the tourism industry. It flourish the plain villages life and promoted people's relations more harmonious than before, besides those function in local, it also has the same function in vicinity especially for the rural economy.

As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 prosper for a long history because it combine with the temple's material culture such as goods' exchange. From this we can see that after the protection of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 we still exploit and use it effective ,it's the only way to prosper persistent that combine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the real life close. Under the Government's drumbeating and guidanc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Jiu Street's temple fair of Flower Festival will go on and full of vitality with time go on, it will promote the religion construction in some economic and socio-cultural aspect.

Keywords: Jiu Street Temple fair of Flower Festival Development Evolution



华中师范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使用授权说明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科研成果。除文中已经标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作者签名：戴雪份

日期：2009年5月25日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华中师范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同意华中师范大学可以用不同方式在不同媒体上发表、传播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作者签名：戴雪份

日期：2009年5月25日

导师签名：王昌洪

日期：2009年5月25日

本人已经认真阅读“CALIS 高校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发布章程”，同意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CALIS 高校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全文发布，并可按“章程”中的规定享受相关权益。同意论文提交后滞后：☐半年；☐一年；☐二年发布。

作者签名：戴雪份

日期：2009年5月25日

导师签名：王昌洪

日期：2009年5月25日



绪论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近代以来,随着农村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产品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农村庙会市场日趋增多,集镇地区多有庙会,非集镇村落亦兴起庙会,同时庙会的商品交易功能也逐步增强。这一时期笔者家乡新洲区旧街镇花朝节农村庙会市场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独特的农村庙会市场特征也是中国近代农村庙会市场的一个缩影。

庙会是中国民间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庙会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庙会作为传统中国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是透析基层社会运行实态的重要视点。它与民众的信仰、娱乐、贸易、交往息息相关,构成了乡村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近年来庙会研究成为国内历史学界、民俗学界、人类学界和社会学界的热点课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笔者亦十分有幸,自己家乡恰恰有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热闹非凡的庙会活动——花朝节庙会。它已历经几百年的时间,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吸引力。这说明这一庙会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剖析它的社会基础和作用,将其积极的方面挖掘出来为当地经济、社会建设服务,并通过研究分析帮助其顺应市场变化促进花朝节庙会蓬勃发展,是笔者从事花朝节庙会研究的目的。

本文的研究对象花朝节庙会作为农村庙会,亦称在乡庙会,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近年以来,对于花朝节庙会活动虽已在被媒体报道宣传,旧街镇花朝节庙会虽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纷纷予以关注研究,但目前对它具体而深入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仅见当地政协有关工作者对它的简单描述和近几年一些媒体报刊对花朝节庙会的宣传报道,而通过此庙会对乡村社会生活进行全面分析的文章,笔者尚未见到。这对花朝节庙会研究来说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因此,笔者选择了这一题目,根据现存的旧街镇地方志资料和田野调查对花朝节庙会作一概述,试图通过花朝节的流传发展和乡村庙会活动的演变分析探究,深入理解旧街镇花朝节庙会发展演变的历史,准确把握花朝节庙会对乡村社会的影响,以期促进花朝节庙会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推动庙会研究中乡村庙会对区域社会的影响,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当地乡村社会的状况、了解庙会对乡村社会的作用和影响;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现实社会结构中的积淀,从而更好地发挥花朝庙会的经济功能和旅游文化功能,为新洲的经济文化建设服务。



二、学术前史

1、关于庙会的研究

早在 19 世纪末,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的《金枝》^①中就可以欣赏到中国广东祈雨会的习俗,此后,荷兰籍汉学家德格鲁特依据在闽南城乡搜集到得有关民间仪式和道士科仪的实证及文献资料,参考上古文本,写出了《厦门的年度节庆: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与《中国宗教系统》等著作,其中涉及到庙会活动。20 世纪 20—50 年代,功能主义人类学家把中国民间仪式看成与宗教同等地位和功能的体系。例如,英国社会人类学大师拉德克里夫—布朗在他的《宗教与社会》(1945 年)一文中花了不少篇幅谈论中国宗教的特性,为中国庙会研究提供了理论范式。1936 年,法国社会学家葛兰言出版的《上古中国的诗歌与节庆》是关于中国民间宗教发生学的一部论著。他的研究已经触及中国庙会的起源问题。60 年代以后,跟庙会生活有关的西人论著重要者如美国的武雅士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与仪式》(1974 年),英国马丁《中国仪式与政治》(1981 年),美国魏勒的《中国汉人宗教的一致性与多样化》(1987 年),美国桑格瑞的《一个汉人社区的历史与巫术力量》(1987 年),美国杜赞奇的《文化、权利与国家》(1988 年),英国王斯福的《帝国的隐喻——汉人“民间信仰”的人类学研究》(1992 年)等。^②

在国外学者对中国庙会的研究中,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日本学者冈田谦,他在 1938 年最早将寺庙与凡俗社会生活连接起来加以分析,提出了“祭祀圈”的概念。这一理论框架对中国学者(主要是台湾学者和香港学者)后来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从以上的回顾不难发现,国外学者对于与中国庙会相关的民间宗教的关注,主要是文化人类学者;人类学的“田野工作”的传统,决定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是当代“民族志”形式,而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成为历史研究的一部分。中国本土学者对庙会问题的兴趣,应该说与西方人类学传统密切相关。

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等人的民俗探访活动就是其中的一部分。1925 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风俗调查会”组织顾颉刚等人到北京城西北 80 华里的妙峰山调查庙会风俗,后发表《妙峰山的香气》等文章,调查报告发表于《京报》副刊,在风气未开的当时,影响颇大。其中《妙峰山的香气》对群众朝拜碧霞元君女神的盛况作了考察研究,分析各种人朝拜、祈福的迷信心理和庙主假神祇敛财的实质,发现

^① (英) 弗雷泽:《金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7 年。

^② 参见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象征与仪式的文化理解”一章的有关内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 年。



了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祈福心理的关系。1928年3月,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周刊出版,陆续发表了不少南方庙会(尤其是广州附近)的调查报告和论说。风气所及,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国内比较有影响的杂志发表了不少有关庙会研究的文章,虽然从性质来说,在当时属于“现实问题考察”一类,时至今日,就成为近代庙会研究的重要论述。如,在《新中华》上叶宗高的《无锡城乡的节场》^①,陈醉云《杭线良渚的香市》^②等。1934年12月,全汉升在《食货》半月刊第1卷第2期发表《中国庙市之史的考察》^③,主要关注作为庙会一个侧面的庙市,反映出传统学术的文献钩索和征引的特色。

20世纪70年代以来,庙会问题受到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民俗学等许多学科的注意。历史学界首推日本学者田仲一成的力作《中国的宗教与戏剧》。它从民间宗教和宗族社会的互动关系的视角考察庙会戏剧,颇具新意。与此同时,北京师范大学赵世瑜教等人的庙会系列论文也很见分量。赵世瑜有关庙会的论著如《中国社会科学》上的《中国传统庙会中的狂欢精神》^④,《历史研究》上的《明清时期华北庙会研究》^⑤,《史学集刊》(1995年第1期)上发表的《华北庙会与江南庙会的几点比较》^⑥;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在《史林》上发表的《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⑦;华中师范大学的严昌洪教授在《在商业革命的大潮中——中国近代商事习惯的变迁》^⑧和《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⑨论著中都用专章论述了庙会经济及其特色。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蔡丰明以《江南民间社戏》^⑩为题的论著也涉及到江南的庙会问题,只不过,他的“江南”范围更小;小田发表的《吴地庙会》^⑪,《中国经济史研究》上的《近代江南庙会经济管窥》^⑫,《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上的《“庙会”界说》^⑬等为庙会的研究作出了进一步的探讨。

同时,史学研究者也纷纷推出了专著来阐述自己多年庙会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2002年出版的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⑭,从多学科的角度审看庙会。同年,小田著《在神圣与凡俗之间——江

^①叶宗高:《无锡城乡的节场》,《新中华》第2卷第18期。

^②陈醉云:《杭线良渚的香市》,《文化建设》第2卷第3期。

^③全汉升:《中国庙市之史的考察》,《食货》半月刊第1卷第2期。

^④赵世瑜:《中国传统庙会中的狂欢精神》,《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⑤赵世瑜:《明清时期华北庙会研究》,《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

^⑥赵世瑜:《华北庙会与江南庙会的几点比较》,《史学集刊》1995年第1期。

^⑦郑振满:《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史林》1995年第1期。

^⑧严昌洪:《在商业革命的大潮中——中国近代商事习惯的变迁》,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⑨严昌洪:《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⑩蔡丰明:《江南民间社戏》,百家出版社1995年。

^⑪小田:《吴地庙会》,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⑫小田:《近代江南庙会经济管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⑬小田:《“庙会”界说》,《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

^⑭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南庙会论考》^①，对江南各地庙会进行了详尽的调查，之后，他又编写《江南场景——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②一书；另外，吴效群《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③从北京香会百年来行香走会活动价值追求的改变看到中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

人类学界，在台湾，庙会是李亦园教授的民间宗教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他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是60年代，但主要的成果产生于80年代，如《信仰与文化》^④，（台北）远流图书公司1978年，《台湾民间宗教的现代趋势》和《民间寺庙的转型与蜕变》，见《田野图像》，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与李亦园不同，台湾的庙会问题研究学者都多少不同的受到了“祭祀圈”框架的影响。在大陆，也有少数学者在“祭祀圈”的语境中研究庙会。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对民间宗教的研究（包含庙会）的贡献，除了他的《山街的回忆——一个台湾社区的信仰与人生》^⑤和《社区的历程》^⑥等著述外，最主要的是他翻译了许多西方学者在该领域的经典著作，向国人介绍了位于世界学术前沿的成就。

民俗学界，比较集中的成果有《庙会文化研究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在《妙峰山——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流变》（中国城市出版社1996年）中也有部分涉及庙会问题的论述，这两本论文集最明显的不足是理论深度不够。由高占祥主编的《论庙会文化》^⑦，是对1991年由文化部门在陕西召开的“全国庙会文化研讨会”的会后结集，希望“对我们如何看待庙会文化这以社会文化现象，尤其是在实际工作中如何开展庙会文化活动都深有启发。”山东大学《民俗研究》1994年和1996年都曾开辟过庙会调查研究专栏。如聂凤峻、刘俊杰著《因势利导，发挥庙会的积极作用》^⑧，吉发涵著《庙会的由来及其发展演变》^⑨，吕继祥著《泰山庙会述论》^⑩，剑君著《曲阜林门古会》^⑪，朱君之、叶涛著《威海望岛仙姑庙与仙姑顶庙会考察记》^⑫等等。另外，郭子升于1990年著《北京庙会旧俗》^⑬，又出版了

^①小田：《在神圣与凡俗之间——江南庙会论考》，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②小田：《江南场景——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③吴效群：《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④李亦园：《信仰与文化》，（台北）远流图书公司1978年。

^⑤王铭铭：《山街的回忆——一个台湾社区的信仰与人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

^⑥王铭铭：《社区的历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⑦高占祥主编：《论庙会文化》，文艺出版社1992年。

^⑧聂凤峻、刘俊杰著：《因势利导，发挥庙会的积极作用》，《民俗研究》季刊1994年第1期。

^⑨吉发涵：《庙会的由来及其发展演变》，《民俗研究》季刊1994年第1期。

^⑩吕继祥：《泰山庙会述论》，《民俗研究》季刊1994年第1期。

^⑪剑君：《曲阜林门古会》，《民俗研究》季刊1994年第1期。

^⑫朱君之、叶涛：《威海望岛仙姑庙与仙姑顶庙会考察记》，《民俗研究》季刊1994年第1期。

^⑬郭子升：《北京庙会旧俗》，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



《市井风情——京城庙会与厂甸》^①，对北京的庙会旧俗进行了介绍。张双林编著《中国庙会大观》^②。近年来，王兆祥、刘文智著《中国古代庙会》^③，脉络清晰对古代生活进行描画；高有鹏著《中国庙会文化》^④，对中国“著名”庙会进行了介绍。2008年，他又出版《庙会与中国文化》^⑤。段玉明著《寺庙与中国文化》^⑥及《西南寺庙文化》^⑦，两书中均将寺庙与庙会的关系做专章研究。

正如著名庙会研究学者小田所说：综观中国庙会探究过程，各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切入民间社会生活后，都已触及到庙会之核。但是对庙会的研究缺乏细加剖析，或者研究者的浅尝辄止即可告成，这种现象突出反映在学科领域分野的学术体系之中：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学以理论体系见长，但其学术旨趣常常是某个社区“整体社会”的描述和反思，历史学和民俗学以资料的排比和比较显能，对其他学科的理论范式和方法的借鉴却不够，尽管学科之间渐呈弥合之势，不过，学科汇通形成的“合力”还未能使用在庙会之上。我们对庙会的研究还应该深入挖掘。^⑧

2、关于花朝节的研究

花朝节，也叫花神节，又称百花生日。虽然花朝节历史悠久，但流传至今花朝节范围并不广泛，庆幸的是我国的云南大理还盛行这一盛大的节日，罗正友在《花朝节上赛金花》^⑨中详述了云南大理的花朝节。在当地花朝节又称潮花节，是云南大理白族民间特有的习俗之一。学者界里关于花朝节的研究也不多见，仅见于葛磊的《花朝节与花神庙》^⑩中提及了百花生日与花朝节的关系，并且提出花神庙在花朝节这一节日中的重要作用；倪世俊在《民间赏花习俗——花朝节》^⑪一文中提及花朝在古代的流传记载，和南方“赏红”的习俗，山东以“花朝节”的阴晴卜农产品的丰收以及现今苏杭兴起的赏年会，表明人们的赏花习俗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3、关于旧街镇花朝节庙会的研究

旧街镇当地人编撰的《旧街镇志》中将《旧街镇花朝节物质交流盛况之由来》

^①郭子升：《市井风情——京城庙会与厂甸》，辽海出版社1997年。

^②张双林编：《中国庙会大观》，工商出版社1995年。

^③王兆祥、刘文智：《中国古代庙会》，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年。

^④高有鹏：《中国庙会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

^⑤高有鹏：《庙会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⑥段玉明：《寺庙与中国文化》，三环出版社1990年。

^⑦段玉明：《西南寺庙文化》，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⑧小田：《在神圣与凡俗之间》，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页。

^⑨罗正友：《花朝节上赛金花》，《今日民族》2005年第5期，第36页。

^⑩葛磊：《花朝节与花神庙》，《中州古今》1999年第4期。

^⑪倪世俊：《民间赏花习俗——花朝节》，《中国花卉园艺》2002年第5期，第45页。



①一部分置于镇志后作特别重视,描述了花朝节庙会的场景和盛况;同年,《新洲县供销社志》出版,书中“农村市场”的“集市贸易”中介绍了“旧街镇花朝庙会的集市交易”^②;《新洲旧街的花朝会》^③中较为清晰地回顾了旧街大庙的历史及由大庙而生的花朝庙会演变成物质文化交流会的盛况。是至今最为全面的关于旧街镇花朝节庙会的记载;新洲区政协编撰的《新洲风情录》一书中,李华树与洪泽民撰写《旧街花朝节》^④作为旧街当地风俗民情的介绍,文中简略提及了旧街花朝节庙会从兴起到解放时期的发展状况;之后,李华树、林进编写的《旧街庙志》(2002年出版)中《庆福寺(旧街大庙)志》^⑤中提及了旧街花朝庙会依附庆福寺(旧街大庙)的起源;2002年梅涛在《新洲花朝节:古朴新潮的庙会》^⑥记录了旧街镇花朝节当年的盛况;李勋在《故乡的花朝节》^⑦一文中,以回忆的手法记录了旧街镇花朝节期间的风情。

在政府的宣传和引导下,随着花朝节庙会转型为花朝文化旅游节,不少媒体报纸也开始对它进行关注和宣传报道。《长江日报》以《新洲旧街开发民俗文化——花朝八百年薪火相传》^⑧为题对旧街镇花朝节庙会做了详细报道。《长江日报》2006年在旧街镇花朝期间又发表《让花朝节走出新洲》^⑨等报道记录了旧街花朝节庙会转型为旅游文化节后当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热闹场面;《湖北日报》近年来在会期发表了《五省群众赶花朝》^⑩,《旧街花朝节——现代版“清明上河图”》^⑪等通讯介绍旧街花朝文化旅游节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现代元素;另外,《武汉晨报》《武汉晚报》《武汉金报》等报刊近年都对花朝进行及时采访和宣传,为旧街镇花朝旅游文化节的扩大声势和积极招商取得了很好的宣传和引导作用,也扩大旧街镇花朝旅游文化节的社会影响。

综上可知,旧街镇花朝节虽历经八百年的流传发展,早已失去了花朝节兴盛的赏花饮酒的风俗,由庙会转变为一个乡镇的物质交流会,继而发展为今天的旅游文化节,虽然旧街镇花朝节历史悠久,但有关于旧街镇花朝节的研究并不深入,集中在新洲区政协及旧街镇当地文人对其流传发展的简单记载。近年来随着湖北省及武

①赵步云、洪泽民:《旧街镇志》1987年,第305页。

②新洲县供销社联合社编:《新洲县供销社志》1986年,第80页。

③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办:《武汉春秋》,武汉-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5年,第58页。

④李华树、洪泽民:《旧街花朝节》转引自新洲区政协编撰的《新洲风情录》,武汉出版社1994年。

⑤李华树、林进:《旧街庙志》,旧街街志办公室印2002年。

⑥梅涛:《新洲花朝节:古朴新潮的庙会》,《今日湖北》2002年第6期。

⑦李勋:《故乡的花朝节》,《湖北档案》2007年4期,第32页。

⑧《新洲旧街开发民俗文化——花朝八百年薪火相传》,《长江日报》2005年3月24日,第2版。

⑨《让花朝节走出新洲》,《长江日报》2006年3月28日,第1版。

⑩《五省群众赶花朝》,《湖北日报》2006年3月15日,第1版

⑪《旧街花朝节——现代版“清明上河图”》,《湖北日报》2007年4月3日,第4版。



汉市政府宣传和对招商的重视，每到会期，省市各级传媒及报刊都对其进行了积极的报道。但这些报道还停留在表面的宣传和报道，并不是从学术上对旧街镇花朝节庙会的深入研究，缺乏从系统的角度对旧街镇花朝节的流传发展的原因进行探讨，也没有发掘出旧街镇花朝节对区域社会发展的意义，这也是笔者进行花朝节庙会研究的主要原因。

三、本文研究思路

本文将通过对花朝节的流传发展和乡村庙会活动的演变分析探究，深入旧街镇花朝庙会发展演变的历史，分析旧街镇花朝节八百年长盛不衰的原因，准确把握花朝庙会对乡村社会的影响，从而得到旧街镇花朝节进一步发展的启示，从旧街花朝节庙会八百年发展演变的历史看庙会与乡村社会生活的互动、看乡镇经济的转型、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看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如何结合才更具有生命力，才能更好地发挥旧街镇花朝庙会的经济功能和旅游文化功能，为旧街镇乃至新洲的经济文化建设服务。



第一章 旧街花朝节庙会的背景

一、旧街的地理位置与人文环境

旧街，位于大别山南端与平原交会处，地处武汉市的东北，属丘陵地带，据《旧街镇志》记载：“过去旧街地处大别山山脚下团（风）、麻（城）古驿道旁，既是山区与平原的交合处，又是水网交错可与江河相通，水陆联运的水旱码头。旱路，东进入大别山腹地、西下武汉、北达豫皖、南至湘赣；水路，沿三庙河入举水直通长江。”

^①现今旧街镇位于新洲区东部，在大别山余脉的大崎山西南 20 公里，距武汉 110 公里。旧街镇地形复杂，低山、丘陵岗地和平原交错，西北略低多岗地，中部、西南部低平。山地面积占全镇 29%，丘陵岗地占 30.3%，平原面积为 35.4%。低山丘陵区广泛种植林木，少量能种植豆、麦、杂粮；岗地区宜水宜旱，肥力中等，主要种植粮食作物；旧街一带由于山河交织，平原多为河流冲积而成，水丰土沃，非常适宜于棉花种植。

该地区目前共有行政村 54 个，人口 8 万余人。农作物品种齐全，有：水稻、棉花、芝麻、花生、玉米、油菜、大豆、红薯等等。尤其是棉花一直是当地民众的主要经济作物。勤劳的人们企盼棉花收成好，就在每年二月十五“花朝节”时，用糯米汤圆祭祀棉花神。因此，在新洲民间流传有“汤圆大，棉花球子大”^②的说法。特色农作物也不少，如：茶叶、板栗、烟草、药草等等，但是，农作物的种植规模都较小，主导农作物不多，农户几乎是家家都种一点，没有形成自己的地方特色。至今，该地区对农产品深加工的企业或工厂也不多，农产品几乎是生产出来后就直接送到市场上销售。自产自销的农业成为当地群众主要经济来源，传统农业经济的特点促进了花朝节庙会上以物质交流为主的市场的不断发展。

旧街镇古为鄂东交通商贸重镇，素来是商贾云集，为鄂东地区一大集市（山货集散地）^③，三庙河横穿旧街镇而过，一条老街（后为吴四公路）纵贯旧街镇，据《新洲县志》载：“很早以前河西既有农村集市，因常遭水灾。有人迁到河东开设店铺，但生意不及河西兴隆。群众仍习惯到原来的老街进行交易，旧街因此得名。”^④，旧志载此地有“河头山尾，堡埠共生”^⑤之称，今日的旧街镇镇中心，花朝节庙会的商

^①赵步云、洪泽民：《旧街镇志》1987 年，第 46 页。

^②新洲县志编纂委员会：《新洲县志》武汉出版社 1992 年，第 661 页。

^③赵步云、洪泽民：《旧街镇志》1987 年，第 27 页。

^④新洲县志编纂委员会：《新洲县志》，武汉出版社 1992 年，第 51 页。

^⑤光绪《黄冈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卷十六，第 26 页。



贸活动正是依托旧街集镇兴起发展的。

旧街地域民众主要信奉佛教，信道者次之。《旧街镇志》记载：1930年到1949年间，寺庙有21座，而道士仅6人且主要为超度亡人。尼姑庵三座共6人。而诸多寺庙中，旧街大庙（庆福寺）的历史悠久、规模大和声望较高，经常举办各种法会而香火旺盛。据当地姓氏族谱和古庙、古水井遗址上出土的石碑记载，旧街大庙（庆福寺）始建于南宋孝宗乾道、淳熙年间。旧街镇花朝节庙会产生于“庆福寺”庙会，此庙原名“东嶽庙”，始建于南宋乾道至淳熙年间（1165—1189）。南宋淳熙七年（1180年）开凿深一丈八尺，口径二尺五的水井两口，称“淳熙”井。宋时香火旺盛，远近知名。元末，罗田徐寿辉红巾军攻占蕲水、黄冈等地，旧街大庙（庆福寺）亦毁于战火。到明末隆庆初至万历二年（1574年）由旧街所属地区五十三族祠堂出资共建，名曰“庆福禅寺”，亦名“东嶽行祠”，俗称五三公庙。旧街大庙才逐渐得到恢复，花朝节庙会也就随之又盛行起来。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还在庙内设戏楼一座，供庙会所用。清咸丰三年（1853年）庙毁于兵，至光绪六年（1880年）复建，民国初年遭破坏。^①

大庙原为三排九幢建筑，庙门院两旁外立有大红石狮一对。中排上幢为禅堂，上有娘娘圣母楼；中幢为五岳圣殿，殿下铸植有二公（15页）尺高铁树一株；下幢为四大公朝殿，左侧高悬洪钟。东排上幢为文昌宫，下有魁星楼；中幢为财神殿，下幢为东西二面。西排上幢为大雄宝殿，内有如来佛、观音大士、地藏王三座神龛；中幢有韦陀神龛；下幢原为关帝殿址，毁后未修，作为园基。阎罗十殿分建在大院东西两边：东五殿下接马殿；西五殿下接土地神殿、牛王殿。院门为某氏女节孝牌坊，门内高建戏楼。著名诗人赵步云曾游旧街庆福寺淳熙井时吟绝句一首：“正是临安题邸时，禅宫凿井欲何之？非关南国增诗翰，为沈忠魂三字辞。”（《琴剑诗集》）大庙殿宇内计数百楹，飞檐斗拱极为壮观。历史上，鄂东一带人们信奉佛、道、儒三教，因此才会出现同一所大庙内建有文昌宫、魁星楼、圣帝殿、五岳圣殿、四大朝公殿等建筑，从而形成了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的表现方式。

庆福寺从清末到民国初，多为乡绅调解、处理，民事纠纷和行政议事场所。从光绪初至民国七年（1918年）为下伍重乡之乡奎行政要地。民国八年（1919年）后设有临时性“联保办事处”。其中民国十六年（1927年）大庙中排设有农民协会办事处，并将四大公朝殿栅门改成高大粉墙印子门。协会成立仅半年停止。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清末举人赵禹门，“九·一八”事变后，从东北吉林第一师范大学回乡，为振兴中华民族教育，向黄冈县请示在“大佛殿”办了一座“县立第八初

^①李华树、林进：《旧街庙志》，旧街街志办公室印2002年，第17页。



级小学”，并在“禅堂”配办私立“兼善”高小（是年天旱高小下期停办），这是旧街公立小学教育的创始。民国三十年（1941年）复修五岳圣帝、圣母娘娘、韦陀、马王、太平老爷等油彩像计三十余尊，并将如来、观音、地藏王塑像改为金身。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秋日寇投降后，大佛殿、禅堂重新开办国民中心小学。一九四九年解放时大庙为区公所办事处。一九五八年，新洲县委文化、宣传领导部门明文指示，旧街庆福寺大庙列为革命遗址，作为新洲县重点革命文物保护，但后来保护不力，南宋淳熙七年（1180年）开凿的古井才逐步废弃，至“十年文革”动乱时期这一遗址全部拆修改建区礼堂和区办公室、宿舍等，从此再非原貌，是一重大损失。1988年迁龙头山重建。^①

大庙（庆福寺）在各种法会举办期间，开坛诵经，信徒多为老人和妇女，其中大部分穿插“放生”的程序，以示慈悲。大庙（庆福寺）诸多的法会^②：如二月初二，土地会；二月十三，娘娘会；四月初八，佛祖会；五月五，龙船会；六月初八，圣帝会；七月十五，狱灯会；八月初三，司命会；九月初三，华祖会；九月十九，观音会；十月还有寒衣会。各种法会的频繁，使得大庙的香火十分旺，在旧街镇及附近村镇也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其中，五月初五的龙船会受到当地居民的特别重视，民国时期，每年会期用蔑扎纸糊的船，涂上颜色，置于旧街大庙，和尚诵经，斋戒三日，邀六名壮汉以手托船，飞快跑至河中沙滩，置船于沙滩上烧毁，以此悼念屈原追祭英雄在天之灵。端午节期间，民众还纷纷自发放河灯。解放后，又增加了踩龙船的活动。当然，最有影响力的还是二月十五的花朝节庙会。古时传说百花仙子生日，附近老少纷纷前往大庙（庆福寺）祭奠花神，顺便祈求一年的雨谷丰登。随着赶会的人的增多，大庙的兴盛，当地及附近群众纷纷利用春耕之际带来物质进行交流，渐而演变为庙会，影响遍及整个新洲地域，成为当地一大盛况，每年花朝，成为当地一大“节日”。

二、关于花朝节的文化起源

1、花朝节的起源

花朝节，也叫花神节，又称百花生日。亦称“挑菜节”，简称“花朝”。自春秋起源，袭至明清，其重要程度可与中秋相媲美。因其经常与中秋节并举，中秋古时又称“月夕”，进而形成“花朝月夕”、“花朝月夜”等成语，流传至今，用来形容良辰美景。花朝节正值春暖花开，是人们外出游玩赏花的良辰。根据不同的记载，

^①李华树、林进：《旧街庙志》，旧街街志办公室2002年，第18页。

^②赵步云、洪泽民：《旧街镇志》1987年，第200页。



花朝节所在的日期也不完全相同，或为农历二月初二，或为二月十二，或为二月十五，说明花朝节是受地域、气候影响的。

2、花朝节的历史

花朝由来已久，古籍中最早的记载见于春秋时期的《陶朱公书》：“二月十二为百花生日，无雨，百花熟。”到了晋代，周处《风土记》言：“浙江风俗言春序正中，百花竞放，乃游赏之时，花朝月夕，世所常言。”^①南朝的梁元帝萧绎的《春别应令诗》曰：“花朝月夜动春心，谁忍相思不相见。”历仕梁陈隋三朝的江总在《传宴玄武观诗》中云：“洁晓三春暮，新雨百花朝。”但总体而言，唐以前有关花朝的活动范围较小，仅限于宫廷内苑。

唐代明确以二月十五日为花朝节，并与元月十五元宵月和八月十五中秋节合称为三个“月半节”，成为重要节日之一。不过仍基本流行于上流社会和官宦阶层，并非全民性的节日。活动内容包括吃花糕，献筹宴饮，踏青赏花，吟诗作赋，伤春怀旧等。

宋朝时，国家版图的缩小并没有影响人们对花朝节的热情，较之唐代，反有过之而无不及。过节人群的范围也由上层社会扩散到了民间。宋代词人周密的《一枝春》可算宋人花朝节的一幅整体白描图：“宫壶未晓，早骄马绣车盈路。还又把、月夕花朝，自今细数。”花朝节在江浙一带的民间尤为盛行，与其地处江南、气候温润关系甚大。另外，《梦粱录》述花朝这天，官员率僚佐出郊，召当地父老，赐以酒食，并劝以农桑^②。《月令辑要》卷六亦载：“宋条制，守土官于花朝日出郊劝农。”^③并引《陶朱公书》，以十五日劝农日，并通过这天天气来预卜当年收成好坏：若是晴和，则主年丰；若为风雨，则主岁歉。这说明花朝劝农在宋代成为政府定制。

3、花朝节的活动

唐代盛行花朝节，节日活动多局限于文人，是日朋友聚会，一边赏花，一边饮酒赋诗。《山堂肆考》卷一百九十四载：武则天于花朝节游园，命宫女采百花和米捣碎后，蒸成花糕，以赐群臣。这种糕有着花瓣的馥郁和谷物的芬芳，很快就上行下效，宫廷坊上一时分外流行。而从正史中的相关记载来看，吟诗作赋似乎已经成

^①（晋）周处：《风土记》，第12页。

^②（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

^③（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六。



为唐代上流社会在花朝月夕的主要活动。如《旧唐书·崔咸传》，崔咸擅长写诗诵诗，每到花朝月夕，风和日朗，高声唱吟，必定潜然泪下。当时的名流皆感叹其志趣高奇。宋代此风尤盛，除了与唐代共有的特征外，宋代还增添了许多新内容，如扑蝶会、挑菜会、市集、拈香祈福、燃灯等活动，且时间上有了变化。东京（即今开封）以二月十二日为花朝节，又为扑蝶会，还要举行民间的“扑蝶会”；但据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则极力描绘了南宋苏杭一带民间过花朝节的盛况：“仲春十五日为花朝节。花朝节时间的不同，正是因为地域的不同引起气候的差异。浙江风俗，以为春序正中，百花争放之时，最堪游赏，都人皆往钱塘门外玉壶、古柳林、杨府云洞、钱湖门外庆乐、小湖等园，嘉会门外包家山王保生、张太尉等园，玩赏奇花异木。”^①当时的都城临安已经形成了许多观赏型园林建筑。这些园林在花朝节时，成为人们纷争踏足之地。著名的如钱塘门外的玉壶、古柳林、杨府云洞等园；钱湖门外的庆乐、小湖等园，以及包家山的王保生园和张太尉园等。其中包家山桃花盛放，连成一片，如同锦幛，极为可爱。每逢花朝节，一些官宦争强斗富，竭尽所能；一些道观华灯万盏，吸引无数士庶前往拈香祈福；还有一些佛寺以佛教仪式、香花异果、名贤书画、珍异奇宝盈溢道场使观者纷至沓来，竟日不绝。

花朝节在唐宋时期已经大体定型。宋以后，袭至明清，活动大抵如同唐宋。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是日，宋时有扑蝶之戏，今虽不举，而寺庙启涅槃会，谈孔雀经，拈香者靡至，犹其遗俗也。”^②清朝花朝节节日活动也较丰富，有种花、赏花、酿酒、踏青等。清代张春华《沪城岁时衢歌·咏花朝》：“春到花朝碧染丛，枝梢剪彩袅东风；蒸霞五色飞晴坞，画阁开尊助赏红。”花朝节这一民俗大约于清末开始逐渐衰退，我们也无法再全然领略当年的风采。究其原因，恐怕与未形成如吃月饼之类的固定节日习俗有一定关系（因宋以后，花糕不再流行）。另外，花朝未被赋予如中秋“团圆”之类的节日意义也应是原因之一吧。

三、旧街花朝节风俗的传承

时至今日，花朝节这一传统节日日渐消亡了。目前，花朝节存在于我国广西宁明、龙州一带壮族人民和云南大理人民的生活中。庆幸的是，笔者家乡所在的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旧街镇，仍保留着过花朝节这一传统习俗。旧街镇当地民众关于花朝节在当地兴起有着各种版本的传说，最具有代表性的有三个：一是百花仙子下凡

^①（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

^②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



游玩从旧街过，见旧街山清水秀不愿意走，便在此落身，从此旧街每逢花朝百花盛开，便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花朝节在旧街兴起；二是位于旧街镇的胡贤大湾的财主大贤，小贤的花园非常大，春天花园里的百花盛开，非常漂亮，于是村民们聚集到三庙河看他家的花园，后发展为花朝节；三是抗战时期，大河冲战地死了很多抗日烈士英雄，血染到三庙河的河堤上，第二年春天堤上开满百花，于是人们用花朝节来纪念这些英雄。可以看出，这些传说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对百花仙子的美好期盼，对财主漂亮后花园的羡慕，对抗战烈士的纪念，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花朝节在当地的悠久历史。

其实，花朝节作为一个传统民俗节日在当地流传已久，在农历的二月十五这天，“媳妇姑娘们用绸缎或彩纸剪制成花朵，挂在树上，贴在窗上，为百花祝寿。”这就是古人说的“赏红”。当地民众认为“花朝节是个吉祥的日子，姑娘都选择这天穿耳环装扮自己，幼男也在这天剪发留鬓。”^①，不仅如此，他们还将人生中的大事婚嫁安排在这一天——“二月十五日花朝民家多以是日嫁娶”^②。而农历二月十五这天，恰逢旧街庆福寺落成开光，吸引了善男信女前来祭拜花神许愿，四方民众云集庙中，祭祀花神，颂神祈福，一时演绎成俗，兴起了花朝庙会。

^①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北省志-民俗方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15页。

^②光绪《黄冈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卷十六，第47页。



第二章 旧街花朝节庙会发展演变的历史

每年花朝节庙会期间，四方群众都会自发赴会。从庙会初期以元宵祭祀花神，踏青访友，到民国时期的物质交流，直至今演变为旅游文化节，成为各种文化活动与经济商贸共举的盛会。旧街镇花朝节庙会也由紧紧依托旧街大庙（庆福寺）到逐渐脱离寺庙，有了固定市场在河滩进行农贸商品交流，直至壮大为今日的旅游文化节。究其长盛不衰的原因，笔者以为，旧街镇花朝节以庙会为根基，因庙会的兴起而壮大发展为其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花朝节庙会在当地乡村生活物质交流显得尤为重要，而旧街镇花朝节正是因其承担了花朝习俗与庙会风俗这两个特性才得以流传至今。在旧街镇花朝节庙会中，民众可以通过拜神、娱乐等活动，解除困惑、放松身心，满足精神上的需求；又可以通过商品交换，获得所需物资，满足物质上的需求。旧街镇的花朝节盛行八百余年而至今不衰，虽早已失去了旧时吃花糕的诗意，却演变成一个商贾云集，影响远及鄂、豫、皖三省十几个市县具有物质交流性质的大型文化旅游节了。

一、兴起与传承时期

旧街镇花朝节因与“庆福寺”庙会的结合而得以发展形成花朝节庙会，宋代庆福寺香火旺盛，远近知名，随着庆福寺香火的兴盛，庆福寺一年一度的花朝会的日趋昌盛，赶会的人也日渐增多。每年花朝日的清晨，经过沐浴斋戒的善男信女，都到庙里顶礼膜拜，一般看热闹的人就在庆福寺庙附近游乐观光。花朝节当天附近吃过汤圆的善男信女们，结伴到庆福寺“点花灯”敬香礼拜神灵，企求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点花灯是庙内举办的集合祭神和欣赏的一种特殊形式，庙内的“五岳圣殿”前有一棵两公尺高的千年铁树，七层树枝的每三片树叶上，可放油灯一盏，全树可放置一百盏油灯。每年旧街花朝节期间，四面八方的群众都来点花灯，称之为“铁树开花”。铁树上百盏灯光排成梅花状图案，璀璨夺目，颇有“火树银花”之势。^①

花朝节庙会期间，正是年节闲日已尽，春耕开始之际，乡民们大都不愿单纯地玩会，除烧香许愿和游玩外，还顺便带一些山货和春耕农用品进行商品交易。早先在旧街花朝节庙会的市场仅限于庆福寺庙门口，进行交易的多半是一些字画、绣屏和带民俗风格的花木编织，到了明末清初，庆福寺所在的街道成为庙会的主会场。

^①陈和润、汪厚川：《新洲风情录》，武汉出版社1994年，第177页。



武汉、黄陂、安徽和河南等地的铜铁器皿也纷纷运来销售。晚清以来，随着农村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日益提高，邻县的黄冈、麻城等地农民慕名前来，顺便带些山里竹、木器等土特产交易。不仅如此，花朝节期间还搭台唱戏，因是庙会戏，所以称之为“圣会戏”一般持续半个月之久，从二月初十左右开唱，逢雨天顺延，唱满十五天。花朝节期间民众玩打卖艺，盛况空前；商贩货客，讨价还价，自愿成交，生意极其活跃，使整个花朝节庙会充满商贸色彩。

究其原因，不难看出，明清以后，乡村社会的农产品日趋商品化，由于鄂东地区小农经营的普遍存在，农民出售农副产品的主要渠道，自然只能依赖作为交通较为便利的旧街镇市场的花朝节庙会，而花朝节庙会在客观上的确促进了当地商贸的进一步发展。

二、民国时期的发展

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急剧变化，农副产品商品化程度日益加深，民国时期，旧街镇花朝节庙会影响已遍及相邻县市。而庆福寺从清末到民国初，成为乡绅调解、处理，民事纠纷和行政议事场所。花朝节庙会期间人们来寺庙祭拜花神点花灯的内容逐渐变淡，但这并没有抑制民众继续参与花朝节庙会的热情。人们仍自发赶会，在寺庙附近聚集进行物资交易。

民国时期的花朝节庙会，仍是民众自发。麻城的生姜、黄花、江苏的绸缎、湖南的湘绣、江西的木耳和香菇等都来赶会。此时市场上商品的品种少但质量好，也促使人们争相购买。民众们利用庙会，选购木掀、木犁、木耙、杪子、宰轱、地耕耙、木架犁等农具备于一年的生产所需，购买树种，花种，果种植；民国四年（1915年）旧街山区的晒烟，参加巴拿马国际博览会比赛获金质奖，定名“东晒名烟”^①，誉满中外。花朝节庙会期间不少外地客商慕名前来采购；妇女们也挑选刀、剪等工具做些缝制活，市场的小吃也以狗脚酥，苕圆子，苕片，米糖、糖人等传统小吃为主，剁馍，油条，包面也是远来的商人在街头充饥的主要食物。当然还有各种花色的布料出现在市场上深得妇女的喜爱，缎子布、还有洋布，路子布，大布，青棉布等。会场上玩拳习打，江湖马戏也很常见。当然，这其中也充斥着瞎子算命，江湖骗术，甚至有“赌徒借庙会人众之机聚于旧街”^②。

旧街镇花朝节庙会本身的规模影响不断扩大的同时，人际交往和婚嫁又推动了参会群众的增多，人口的迁移或者远嫁的姑娘或者外地的媳妇，亲戚的亲戚，亲戚

^①赵步云、洪泽民：《旧街镇志》1987年，第3页。

^②赵步云、洪泽民：《旧街镇志》1987年，第203页。



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做小买卖的，打工的，农村的单调生活使得旧街镇花朝节这个农村庙会集市具备了很大的吸引力。据左家竹园王凤华老人回忆，“此时，外地的小商品在市场上十分普遍，如罗田的大扫把，江夏的椅子等手工制品。因亲戚多，当地的民众在过年时便准备了花朝待客的点心，而花朝节当天，当时还是小姑娘的她在凌晨三四点就要和家中姐妹起床忙活做汤圆招待罗田、英山的亲戚，而因为人太多，汤圆用大簸箕装。而当时许多像她这样的姑娘家根本没有出门的机会，就在家招待亲戚客人。”因三庙河穿旧街镇而过，往来的人们要坐船过河，会期人多，“柳林来的三条船在河里渡客。因人多挤船时有翻船的现象，以至常常出现翻船岸边等船的人大笑的场面，更有一些不买什么的人，看稀奇讨兴致，挤在河堤上等着看人落水”（王凤华口述）^①。这些庙会上的乐趣，大概足使民众在这一年中一再将这次狼狈搞笑的场面津津乐道直至下年庙会的开始。

花朝节庙会自形成之日至今，不论天灾战祸，从未间断。1938年，日寇占领新洲后，实行“三光”暴行，旧街一带常遭日寇“扫荡”，花朝节庙会临近，日寇严禁民间集会，但群众将定期的交流会移至三庙河上游河滩上白莲河附近举办花朝庙会。1946年，国民党军队33师驻旧街某部为了围困阻隔新四军五师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在旧街周围修筑碉堡，并在周围布满铁丝网。^②花朝节庙会期间，不准乡民集会，人们则暗迁会址于旧街附近的枫树岗举办。

三、转型时期

解放后，一九五零年人民政府将这一庙会改为“旧街花朝物资交流大会”，会期从农历二月十五一天延长为二月十四至十六三天，这对活跃旧街市场经济起到了促进作用，在党和政府的引导下，旧街花朝节庙会逐步摒弃了封建迷信成分，使之成为广大群众进行游乐和物资交流盛会，成交物质以土特产品、木料、耕牛、手工制品、小型农具为主。

解放后花朝节庙会的地址得到了重新确定。1949年解放时庆福寺改为区公所办事处，之后大庙全部拆修改建区礼堂和区办公室、宿舍等。参加花朝物资交流会的民众并没有被庆福寺庙会这一固定地址的消失限制，积极寻找并确定了新的地址，同时扩大了庙会举办的场所。这一方面是寺庙的衰落引起，另一方面花朝物资交流会经过政府的宣传和造势声势不断扩大，庆福寺及其门口的道路也不能容纳下这样多的群众进行商品的交流，确定新的会址也成为了大势所趋。会址的选择靠近庆福

^①王凤华：女，生于1936年，口述时间为2007年6月。

^②新洲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新洲文史资料》第三辑，新洲县委机关印1995年，第89页。



寺，即庆福寺依傍的三庙河中。二月初，当地政府会组织乡民围堰枯干一段河滩，这样便于花朝节期间人们在河滩上进行交易。

解放后，随着“物资交流大会”的定性，花朝物资交流会期间旧街镇政府主持成立了大会主席团。用高音广播每天向大会广播会议章程，对治安、大会进行宣传，对税收、经营管理部组织专人管理。随着机械生产、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农机药械、布匹、针织百货、电视机等商品进入市场，极大的促进了农村物质文化需求，花朝节的物质交流市场现出繁荣景象。此外，会期还有丰富的文化生活，电影，录像，评书也进入了市场，填补了戏剧之外的空白。交流会市场不断扩大，除本地群众参加外，黄冈、黄陂、红安、麻城、罗田、英山、鄂城以及安徽、河南等毗临省县的商贾顾客也来赶会，每次集会约 10 万余人众。1958 年东北哈尔滨商来旧街赴会购买钓鱼钩九千多杆，成为花朝物资交流会上的“一大奇观”^①

改革开放后，花朝物资交流市场日趋成熟，商品繁多的同时，市场扩大，旧街镇政府对市场重新管理划分，将花朝物质交流会的市场划为五个部分。花朝物资交流会作为一个以物资交流为主题的庙会，开始走向鼎盛时期。

1979 年以前，花朝物质交流会的成交物质以土特产品、木料、耕牛、手工制品、小型农具为主。1979 年以后，会期交流规模不断扩大，武汉、黄石、鄂州等城市的有关商业部门，也驱车运货前来赴会交易。副食、匹头、五金、交电、农用机具等工业品、高档商品个大型生产资料，在交流市场上占的比重相继增加。1985 年，旧街交流会，集会达 10 万人众，附近三、五里，可闻会上喧闹之声，交易品种繁多，摊贩货架数以百计，三天成交额达 35 万元。^②“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极左思潮影响，不搞经济主义为名，长途贩运、小买小卖被视为资本主义，一度禁止举办物资交流会，但每年会期，远近人们仍携带钱物，自行车于旧街东北二里的枫树岗赴会，将货物摆满山头进行物质交流。^③花朝物资交流会期间，穿旧街而过的三庙河河滩，两岸延绵几公里，帐篷千顶，商摊互连，依俗自发分成木器、竹器、铁器、生资电器、日用布匹、耕牛畜禽等六大市场群落。旧街大桥（建于 1973 年）的兴建不仅在交通上方便了参会群众，桥下穿镇而过的三庙河滩也在会期成为物质交流的场所。河滩的北边划为耕牛市场，中间为戏台，马戏团兼夹其中，桥下为农耕用具，河滩南面为果树与家具，纵贯旧街镇中而过的吴四公路成为小摊贩摆摊的集中地，小贩沿街道两边摆摊搭店，秩序井然。而镇政府所在地的道路为布匹市场所在地。手工制作的油纸伞、油布鞋、竹烟斗、烤烟丝、木便桶、木踏板、木水车、木秧码

^①赵步云、洪泽民：《旧街镇志》1987 年，第 506 页。

^②新洲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编：《新洲县供销社志》1986 年，第 8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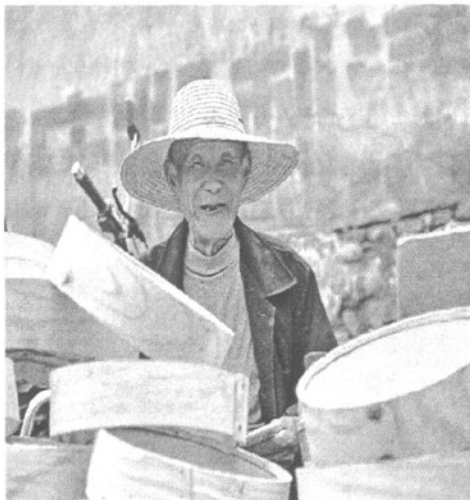
^③赵步云、洪泽民：《旧街镇志》1987 年，第 507 页。



等物与现代电动灌溉设备、机制钢刀碗筷一同销售，品种多达 3000 余种。可以说旧街花朝会就是鲜活的中南地区乡村农耕生活方式的实物大会展。



（选购农具的农民）



（出售自制农具的老农）



（出售自编斗笠的农妇）



（挑选农具的村民）

1994 年和 1995 年，旧街镇政府连续两年在河滩中间举办了福利彩票抽奖活动，民众显示出极大的参与热情，令笔者记忆深刻，由于参会的村民大多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活动，被这种新鲜而带刺激的活动方式吸引，蜂拥前往购买，甚至于一些来做买卖的小商贩都放下生意积极排队购买彩票希望中奖，在整个会期，民众们在购买彩票之余对其它的物质交流的活动兴趣明显下降，人山人海拥挤在河滩，喊叫声，中了小奖的村民的大叫声，挤散的小孩的啼哭声，没有中奖的人的叹息声交织在一



起,人声鼎沸。在 1994 年会期中举办的抽奖活动,各家各户出动买彩票乃至附近市区的民众也特意为买彩票而前来参会,群众们会期的交谈,吃饭,都围绕“有没有去抽奖”“抽到什么”这样的话题,已经呈现群体为彩票疯狂的状态。而乡村群众又偏信于小孩的“手气好”,家家去买彩票都扛着小孩在肩上,从桥上看下去密密麻麻的人头,非常壮观。

但是,九十年代末后,花朝市场已明显凸显后劲不足的趋势,此时,旧街镇商店增多,群众平日需要的日常商品需求可以通过店铺买卖得到满足,农贸生活用品在商店里基本齐全,乡村人口的日常所需也较容易得到满足,不用再单纯依赖花朝会期的物资交流;外出务工人员增多,使得留守家乡的老弱妇幼成为市场的主力军,降低了购买力;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参会商品多以劣质低价取胜也不再具有大的吸引力;市场管理混乱,外地小贩常被恶意收费等等,花朝游玩者开始走向“看热闹的多,做买卖的少”的尴尬境地,虽然旧街镇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花朝节庙将继续保留发挥它的经济功能,作为市镇集场的必要补充,但花朝物资交流市场急需新的活力的注入是毋庸置疑的。

四、繁荣时期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日趋灵活,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备受当地人关注的庙会,从规模和形势上日趋低迷。为了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新洲区政府借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引导花朝物资交流会向花朝旅游文化旅游节转型。2003 年新洲区政府在旧街正式举办了第一届花朝文化旅游节,并将会期顺延为五天,新洲区区政府和旧街镇镇政府利用各方面的宣传和管理在花朝节市场上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政府利用每年固定搭建给村民听戏的戏台成功为第一届花朝旅游文化节进行了剪彩,武汉市及新洲区领导纷纷致辞祝贺,之后戏台上进行了内容丰富的开幕式表演,精彩的表演获得了群众的一致认同,其新鲜的方式也激发了参会群众的热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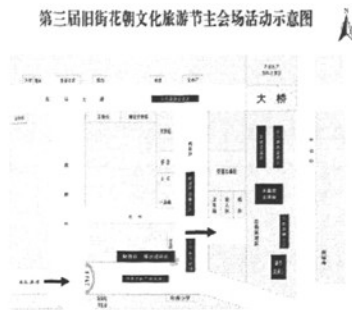
2005 年,第三届花朝文化旅游节活动得到了省市领导的重视,以“五省群众赶花朝,武汉市民游旧街”为基调,进行广泛宣传,扩大旧街镇花朝节的吸引力,为了将这一盛会打造成为全省知名的节庆活动品牌,新洲宗教旅游局特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花朝文化旅游节会标图案。会标最终采取了传统的中国画大写意形式,以书法的“花”字为主图,图中蕴含了山水寺庙的意境,体现了花朝文化的源远流长,图形采用了“青山绿水”中的“绿水”为河流(三庙河、沙河)构成主线,穿插三个象征古庙的黄色图形进行点缀,既点明了花朝节的发源地是三庙河与沙河的交汇地



旧街镇，也说明了旧街镇山青水秀的特点。此后，每至会期，整个会场都插满了带有会标的彩旗，十分醒目。



(旧街镇花朝文化旅游节会标)



(第三届花朝文化旅游节会场示意图)

在省市领导的关注下，第三届花朝旅游文化节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省市领导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塑造花朝文化旅游品牌，各部门各机关都为旧街镇花朝节投入了不少精力。此外武汉市中心医院在镇中心医院门口举行现场大型义诊活动，获得了乡民的肯定；武汉市劳动局举行“送春风行动”现场咨询活动，免费帮助在家务农的村民寻找合适的外出务工岗位。这两项落于实处的创新工作使得这次的花朝文化旅游节得到了村民的极大肯定。并且，因为湖北省及武汉市的大力宣传，招商引资工作也得到了明显成效。旧街镇政府在招商的同时，也对市场管理予以重视：活动期间，严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严禁哄抬物价、欺行霸市现象发生。区直各有关部门、各相关街镇要切实加强领导、统一思想、通力合作，确保此次活动安全、文明、有序并取得圆满成功。

2006年第四届花朝文化旅游节吸取了上届的成功经验，并推陈出新，以“五省群众赶花朝，武汉市民游新洲”为主题，将第四届“游旧街”的主题壮大到“游新洲”的主题。新洲区政府在此次活动中将传统的花朝节与整个新洲的乡村休闲游结合起来，借机促进整个新洲区节庆旅游和乡村休闲游的发展。此次花朝文化旅游节分为五个区域：耕牛交易区、农业生产资料交易区、农民生活用品交易区、特色农副产品交易区和鄂东乡村文化交流区，主要满足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物资需要。规定各参展商贩必须按划定区域和面积进行物资交流。



（第四届花朝旅游文化节开幕式）



（观看开幕式表演的群众）

2007 年第五届物资交流会上物资交流会会场分得更细，分为八个区域：耕牛交易区、农业生产资料交易区、农民生活用品交易区、鄂东乡村文化交流区、现代农机具展销区、特色农副产品展销区、苗木花卉交易区、“和谐城乡游”旅游产品展示区。另外，在乡政府所在的一条道路上，开展新洲特色农副产品展销，大力推介宣传新洲区楚天名优特产，如徐古蘑菇、双柳蔬菜、陶河炒鸭、汪集鸡汤、张店鱼面等 30 多种新洲特色农副产品大大增强了花朝市场的经济含量。增设的现代农机具展销区，目的是为了宣传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促进农业机械化发展，由区农机服务中心具体承办。进一步开展新洲区农业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为贯彻中央 1 号文件关于“用现代物资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技技术改造农业”等指示精神，花朝节期间，在旧街活动现场举办新洲区农业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推进农业科技进村入户工作。为进一步宣传吸引旅游爱好者，此次花朝旅游文化节还举办了“千年庙会又一春”摄影比赛活动。摄影比赛面向全国，立足省、市、区专兼职摄影家及广大摄影爱好者和旅游观光者。不仅如此，政府也从旅行社寻求突破，在花朝期间开展“乡村休闲一日游”活动，联手东星国旅、中国国旅、好山好水旅行社等企业，组织游客到道观河景区、旧街成楼寨茶场及各休闲山庄、乡村踏青、采制茶叶、观田园美景、尝农家美味、购特色农副产品、体验农事活动。这次花朝旅游文化节，进一步丰富了花朝旅游文化节的内容，扩大了花朝旅游文化节的内涵，使旅游文化显得更有特点。

随着花朝文化旅游节活动的开展，报纸媒体每到会期争相报道，旧街镇花朝旅游文化节知名度越来越高，开展文化旅游活动，吸引力和辐射力更强，物资交流大规模提升。闽、粤、豫、皖、湘、赣等省的游客商人，如潮水涌至，日进出集镇多达十余万人之多。



第三章 旧街花朝节庙会长盛不衰的原因

“树发芽，草返青，花朝赶集去相亲。看大戏，瞧杂耍，烧香许愿求仙卦。吃面馍，切蒸糕，米粑油果尝个够。买付犁，卖把镰，逛过庙会好下田。”这首广泛流传于鄂东地区的乡村小调，展示的即是武汉新洲旧街花朝会的景物风情。旧街镇花朝节庙会以农具、耕牛、日用物品、小吃食品为主，成为新洲区旧街镇乃至整个新洲区农村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要补充，虽然花朝节庙会在发展过程中，关于庙会的祭祀的内容逐渐减弱，但其多元功能的互动关系不断调整，各种功能的内涵逐渐演变，商贸与文娱功能日益增强。花朝节庙会期间，群众不仅赴会购买物资，观看戏剧马戏等娱乐活动，走亲串友，甚至开台聚赌，始终伴随着大量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花朝节庙会流传八百年而未间断，与当地乡村社会产生了各方面积极的互动。

一、多重功能是源泉

1、宗教活动的场所

在古代文化不发达，人民群众在对自然界无法解释的现象或者社会力量的压迫下，民众更多地求诸神灵的解释，神灵信仰普遍存在于整个社会，不管是哪种信仰，都是为了获得某种自认为合理的解释，只有这样，民众才能化解人生的困惑，充满信心地面对人生的种种。庙会首先满足了这种宗教情感的需要。涂尔干在对这种神圣存在的特质解释为：“只有在人们的心灵将其表现为生活着的存在时，它才存在。当我们不再这样想时，它似乎就不存在了。”^①从这里，人们得知，神圣存在需要人的帮助，正如人离不开神圣存在的帮助一样。每届庙会，人们便唤醒被弃置于意识角落的神圣存在，为其补充能量，加强对神圣存在的记忆；庙会结束，这一切又渐渐归于沉寂，直至下一次循环。神圣存在便以蛰伏—复苏的循环往复的方式存活于社会生活中。民众时时幻想用神圣的存在来安慰自己，借助神圣存在来保护自己，他们常常把自己对物质利益的需要寄托在对神生存在的宗教信仰上，因此对拜神拜佛活动格外的虔诚，祭祀神灵的庙会活动满足了群众的需要。百姓唱戏酬神，吸引香客。这些人中，既有虔信神灵求乞保佑者，更有为看热闹而来，顺便烧香叩头。当祭神的人越来越多，便为商贩提供了良好的赚钱机会，于是庙会就逐渐演变成祭神、游乐、贸易三合一的集市。

^①（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52-453页。



早期的花朝节庙会围绕庆福寺展开的，人们借由花朝庙会的举办从四面八方赶至庆福寺，一方面拜祭花神，赏红，点花灯，另一方面，庆福寺的各方菩萨都会一一上香叩拜，许下心愿，来年再来还愿。正是这样的心态，形成了旧街镇花朝庙会初期的信徒云集的基础。一年之初，春日农耕之前，去庆福寺烧香拜佛，祈求一年的作物丰收，人际顺利，或者姻缘美满。下一年的会期，再来还愿。

2、物资交流的平台

不难看出，作为休闲生活方式的庙会节奏，花朝节庙会明显体现出传统农业社会的特征。花朝节庙会之际，正是农民春耕与准备夏收的季节，体现了庙会安排中劳逸结合的原则。旧街镇花朝节庙会商品是以农耕产品为主，兼及日常生活用品，庙会市场井井有条，赴会的有当地的农民，也有商人。花朝节庙会期间，旧街的道路至三庙河河滩及沿岸，帐篷、摊铺绵延数公里，突出“农”字特色，形成农资、耕牛、农机具、特色农副产品、农民生活用品等六大市场群落。解放初期传统的手工农用生产工具整个庙会市场占有很大比重，如的木犁、木耙、杪子、宰耞、薅扒、板锄、秧扒、抓钩、耳耙、铁锹、沙镰、草镰、铁钩、锄头、扒锄、铁锹、连枷、石碾、扬叉、木齿耙、木锨、风簸、簸箕、筛子刮板等；还有瓜果林木苗和肥料；还有些日常生活所需的木船、划子、囤盆、扁担、冲担、绳索、水桶、粪桶、竹制的箩筐、菟箕、筲箕等，此时农耕用品成为赶会群众备耕主要购买商品。80年代后，随着机械化的普及，传统农用生产工具减少了一些，如传统的水车和木犁已消失，但仍保留了一般耕作所需的农具，只是农产品的材质逐渐被铁器取代，更多的是日常生活用品，如竹扫把，竹簸箕，木质粗糙简单的桌椅板凳家具用品。可见，花朝节庙会市场的物资交流在跟随时代的变化来吸引赶会群众，市场上农产品和日常生活用品相当齐全，可供人们农耕和日常生活需要尽情选购，所以吸引了参会群众积极前来购买。农历的二月正是备耕之时，群众选购瓜果林木，正是移植嫁接的好时候，而花朝节庙会上参会的群众多，市场需要大，购买能力增强，商品流通大，商贩们每年赴会的积极性也有了保证。这些商贩，有当地固定的商业者，每年花朝节庙会期间因固定的营业场所可以赚到一年中较大的利润，也有临时商贩，多为当地农民，在农闲之余，将家庭手工业生产各种器物都拿到市场上进行售卖，既增加了农副产品的价值又可以贴补家用；更有手艺精湛者生产一系列手工农具或者农特产品利用花朝节庙会期间出售，将其视为一年中一大经济收入；外地流动商贩四处赶会赶集，因为旧街镇花朝节庙会会期固定，规模较大，不少外地商贩都是每年前往。

花朝节庙会市场专门辟有耕牛交易市场，耕牛市场也是旧街花朝节庙会的一个



特色。土地改革后，耕牛归农民所有，农民如获至宝，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纷纷订立爱牛公约，掀起护牛运动。1951年，县政府作出《关于保护牲畜安全过冬的指示》。此后，年年发文，要求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认真做好这一工作。徐古、旧街、张店等地，每年于二月花朝节庙会前后，均开展耕牛交易活动。附近村镇农民纷纷前来进行耕牛买卖；随着经济的发展，花果林木的交易也逐年兴盛，越来越多的群众意识到农副产品的创收的重要性，积极购买花果林木，政府也自印讲授科学种植花果木的小册免费分发。

经济活动是庙会经久不衰的物质基础，随着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群众的需求的增大，花朝节庙会的物资交流为当地民众带来了经济收益，为农民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带来了便利，也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农村的一些副业和手工业也得到了发展。从庙会上购买农业生产工具以及果树花种，为一年的农耕做好准备；有些半公半农的手工业者，在农闲期间做些家具，农具，玩具，炊具，趁庙会人多，运来售卖，既实用又便宜，市场效益不错，也为家庭创收；还有些瓜果小吃等土特产也在庙会期间趁人多有机会出手，而赶会的群众也趁庙会期间卖点便宜实用的商品。这使得花朝节成为群众积极进行物资交流的平台。

3、人际交往的桥梁

人不仅有物质上的需要，而且需要精神上的满足。在庙会期间，人们精神上的需要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满足。赶会的群众们通过积极同他人交往，获得他人的支持和帮助，更有甚者借由庙会展现自己的才能，让别人对自己的能力进行首肯，表现自己的价值，这些人的社会性的本质需要，为人民乐于参加庙会增添了不少动力，人们因此对庙会也更加喜爱和支持。随着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花朝节庙会功能的逐步完善，人们对花朝节庙会的参与热情也日益高涨起来。

花朝节庙会给了当地农民群众在农闲时刻进行人际交往的机会。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农民群众平时各忙生计，见面叙谈的机会很少，利用花朝节庙会期间，平日少有机会相聚的乡亲朋友亲戚齐聚会场。年迈的老人冬日不大走动，趁着春暖花开时也愿意去亲戚家走动，顺便看下戏赶下场。隔壁村，街对面，亲戚的亲戚，各乡各村的亲朋好友携儿带女，从四面八方会场汇集。在街头巷尾，拥挤的河滩边玩边谈，密切了联系，互通了信息。一些原本不熟的，经亲朋一介绍，也成为了熟人，逛完庙会，也扩大了人际交往圈。

这其中，妇女的活动显见的频繁起来。庙会是一种具有宗教色彩的社会活动，既能满足女性在主观上向社会主流意识靠拢的愿望，又能满足女性客观存在的心理需求和生理需求。所以，女性可以大大方方地“赶庙会”，不必担心“人言可畏”。



正是这样，一向很少参加社交活动的女性成了花朝节庙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她们对花朝节庙会寄予了极大的热情。花朝节庙会期间，大大增加了妇女与人交流的机会。无论是本村还是邻近村庄的妇女在逛会前都会将自己打扮一番，民国时期，妇女以桃红绸上衣，绿绸的裤子为基本款式，头发为圆髻，头插花，经济宽裕的人家会佩戴金银首饰，拿束花。如今，没有了固定的穿着，妇女们更注重打扮自己了，各式各样的美丽装扮，偶也会见到一两个新潮的妇女十分摩登，这也让花朝节比平日见到更多美丽的妇女。待收拾整齐，便结伴前往会场，逛会赶集。年轻的相约购买家庭用品或者选购自己中意的小玩意，不少年轻女性也选择在这天穿耳洞有吉利的意味，年老的则常常围在戏台前边听戏边拉家常，成为花朝节一大景观。还有些妇女借赶会之隙走亲串友，省亲看女，共叙离别之情。在这有限的几天内，女性终于有机会互诉衷肠，名正言顺的赶集逛会。

当然，花朝节庙会期间最热闹的莫过于当地镇上的居民都纷纷设宴款待宾客。在花朝节庙会期间，家家杀鸡宰鸭，以丰盛的食物招待宾客，甚至许多人家将过节的节日食品特地留有一部分用作花朝节庙会期间待客。当地居民以请到客人多为自己的荣耀，以显示自己的经济实力和良好人缘交际关系。自家的亲戚，朋友，临村的长辈甚至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凡是熟络亲朋的都会被邀请来家里作客。甚至有在街上买卖游玩时结识的朋友，都会热情邀请到家中作客。这来源于当地群众纯朴的思想，广结人缘，一年的操劳换得可以体面待客来充分体现自己的价值，也大大和谐了人际关系。

4、娱乐大众的舞台

早期庆福寺庙台戏是花朝节庙会群众赶会的一项重要娱乐项目。民国时期因庙台的毁坏，当地的乡绅或富商每年自己出钱将戏台搭在河滩，请乡间剧团来演出楚剧、黄梅戏。解放后，搭台唱戏主要由政府和个单位出钱筹备，开始注重戏剧班底的正规化，大多请的是省市的专业戏剧班，戏剧的表演曲目也大大增加。80年代后，不少外地的歌舞团、马戏团也来演出，吸引了不少当地及附近群众赶会。花朝节庙会转型为花朝旅游文化节后，由政府出面组织在农历二月十五当天上午搭建的戏台上举办花朝开幕式表演，邀请省内著名的表演艺人，现代歌舞纷纷登台，其中湖北大鼓及乡间小调十分受欢迎，许多赶会群众一清早便拥挤在舞台前等待观看。表演结束后，再上演一周的戏剧表演。由此可见，花朝节庙会的娱乐活动在与时俱进的同时，更注意贴近赶会群众的生活和口味，让赶会群众欣赏到平日难得见到的高水准表演，一年的操劳得以放松，在津津有味回顾庙会所见所闻中期盼着来年的更精彩的表现。



除传统戏剧表演外,花朝节庙会期间还有着各式的娱乐活动。河堤边也有不少民间艺人赶会。有演皮影的,说书的,踩高跷的,武术、杂耍;也有小孩子们中意的木刀竹枪,捏面人,小泥人,皮老虎;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歌舞团,马戏团,套环,电动火车,临时游乐场等等丰富了庙会的娱乐项目,不仅让大人们大饱眼福,也让小孩们享受了极大的乐趣,传统民间活动和现代娱乐活动的结合使赶会群众充满兴致。

花朝节因参会的人数众多,街巷的窄小使得年年人挤人无法走动的景况经常发生,这也为赶会的人增添了几分狂欢的趣味。因为许多赶会的群众抱着“什么都不买,就在路上挤挤,看看人头也好”的闲玩心态。村民们平日做着农活,闲适下来的群众赶花朝以人多为乐,挤来挤去。如碰到街上人头攒动,前进受阻的时候,有吆喝的,有故意推拉的,有出风头硬要冲开条路走的,有干脆远地站着不动看热闹的,甚至有人趁机占占挤在旁边妇女便宜的,这样,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紧紧贴在一起,笑的说的吵的闹的哭的,一时人声鼎沸,一堵就是半天什么也不能买,但大家却习以为常,不慌不忙,反倒乐于享受,觉得今天终于被挤到了,不失为一种狂欢的心态。

综上所述,花朝节庙会在早起以庆福寺为依托,庆福寺作为当地民众宗教活动的场所,使赶会群众在神圣祭拜中寄予精神寄托;而每年固定的花朝节庙会,成为了参会群众物资交流的平台,为民众日常生活提供了保障;会期亲朋好友来往密切,花朝节庙会成为人际交往的桥梁;花朝节庙会会期打杂玩耍,逛会听戏活跃了平淡的乡村生活,又成为娱乐大众的舞台。由此可见,花朝节庙会的这些功能满足了民众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需求,故能长期延续。

二、民间与政府互动是保证

庙会的形成和发展,必须有人去倡导、组织。从自然演变过程说,庙会最初完全是出于民众的自发,并无什么组织可言。时间长了,会日、形式和参与对象相对固定下来,就形成了一项制度化传统。但随着形形色色的人加入其中,庙会的壮大使庙会市场也需要得到相应的组织和管理。可以想象,在这一过程中,一定有许多促使组织定型的关键性环节,旧街镇花朝节庙会得以形成并延续至今,民间和政府的互动是其能发展起来不可忽视的因素。

1、乡绅与商贾的主导

近代至民国,旧街镇花朝节庙会一般由村民推选本地乡绅或德高望重的知名人



士担任,也由本地富户出任会首。会首的基本职责是组织庙会的各项活动,如酬神的庙会戏的经费开销具体事宜,各种商贸活动和娱乐活动的组织,并对庙会收入和支出进行管理。在花朝节庙会活动中,乡绅和商户除了由他们负责向参与者摊派所需费用外,自己还要贴钱,“搭台演剧一节,耗费尤甚”,人们还是乐此不疲。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是难以想象的。

当地商人为了在花朝节庙会取得更多的经济利益,积极参与庙会活动,而乡绅们则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或者壮大势力,或者虔诚地向神佛许愿积极出钱或者筹款进行祭祀和庙会戏的演出。由当地乡绅或商户出钱,在河滩上搭台唱圣会戏。乡绅富商利用“圣会戏”唱戏酬神许愿自家平安是其主要目的,同时向当地群众显示了自己的经济实力提高威望,也因给乡亲准备庙会戏而增添做善事的机会。据《旧街镇志》记载,民国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圣会戏”期间,有一群民众足銃药过猛,爆炸误炸死赵寿卿小孙子,赵寿卿作为旧街镇当时非常有名望的乡绅,正是这次“圣会戏”的主要组织者,而“寿卿并未要胜伢赔安葬费,乡民均称颂寿卿之德望。”^①可见,此次圣会戏极大地帮助赵乡绅提高了德望。

2、广大民众的参与

花朝节庙会期间,赶会群众为了备耕,同时享受一下乡间难得的娱乐休闲时光,积极赴会。随着花朝节庙会影响的逐年扩大,各级政府部门在花朝节庙会之前都积极扩大声势,进行招商宣传引导,经济的发展,交通的便利,赴会商贩渐渐增多,湖北,湖南,安徽,河南,内蒙古等地均有赴会商贩。有些外地商贩年年赴会,到了会期就自行赴会,已成固定参会商。不仅如此,参会群众不仅人群固定,且人数也不断增多,1985年,旧街交流会,集会达10万人众,附近三、五里,可闻会上喧闹之声,交易品种繁多,摊贩货架数以百计,三天成交额达35万元。^②

3、政府的支持与引导

在90年代末借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2003年新洲区政府在旧街正式举办了第一届花朝文化旅游节,并将会期顺延为五天,而新洲区区政府和旧街镇镇政府利用各方面的宣传和管理在花朝节市场上发挥了积极的引导作用,其支持与引导的方式也得起了赶会群众的肯定。2005年,第三届花朝文化旅游节活动得到了省市领导的重视,以“五省群众赶花朝,武汉市民游旧街”为基调,进行广泛宣传,扩大旧街镇花朝节的吸引力,将这一盛会打造成为全省知名的节庆活动品牌,新洲宗教

^①赵步云、洪泽民:《旧街镇志》1987年,第5页。

^②新洲县供销社联合社编:《新洲县供销社志》1986年,第83页。



旅游局特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花朝文化旅游节会标图案。在湖北省市领导的关注下，第三届花朝旅游文化节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武汉市中心医院在镇中心医院门口举行现场大型义诊活动，获得了乡民的肯定；武汉市劳动局举行“送春风行动”现场咨询活动，免费帮助在家务农的村民寻找合适的外出务工岗位。这两项落入实处的创新工作使得这次的花朝文化旅游节得到了村民的极大肯定。在湖北省及武汉市的大力宣传，招商引资工作也得到了明显成效。在招商的同时，政府也开始关注市场收费问题，明确强调：活动期间，严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严禁哄抬物价、欺行霸市现象发生。

2008年，为应对一直备有争论的市场收费上，旧街镇镇政府明确通知：“成立领导小组，将市场地段划分、人员分组并提出了明确收费任务及要求”。对“票据的启用、管理，摊位划定，固定摊位提前出售，要求工作人员一律带袖章上岗，收费时既不能收人情费，又不能随意抬高收费，同时要负责维持好市场秩序”^①。并明确出各地段收费标准指导数。收费政策的透明化，有利于对花朝旅游文化节市场进行合理有利管理。

三、庙会自身的不断演进是活力

庙会是一种以庙宇为依托，在特定日期举行的，集祭祀神灵、交易货物、娱乐身心于一体的集会，它涉及到民众的经济生活、休闲生活和各种公共生活，满足了民众的多种需求，对民众的生活发挥特有的功能。随着明代中后期城乡商业贸易的不断发展，花朝节庙会在明清时期繁荣起来，其功能也日益完善起来。近代以来，花朝节庙会趋于稳定，但其宗教功能和世俗功能此消彼长，解放后长期的无神论教育使得花朝节庙会的宗教色彩日渐淡薄，商贸功能更加突出。如今，花朝节庙会已转型为“旅游文化节”，为它的继续发展补充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综观可知，花朝节庙会历经八百年的历史而能持续发展，其自身不断演进，跟随时代的发展是确保其活力的重要原因。

1、世俗功能与宗教功能的消长

在进入封建社会后的农业社会，由于农事生产关系个体家庭成为农业生产方式的主体，农民终日辛苦劳作于有限的土地上，生活于家庭的狭小环境之中，长期的个体耕作与封闭的家庭居处，对于人身心产生着拘谨和压抑，于是人们乐意安排节俗活动，并且倾全力支持这种活动，庙会生活的出现，满足了人们利用宗教祭祀的

^①新洲区第六届花朝旅游文化节《关于市场收费管理条例》。



神圣氛围冲洗自己的抑郁情怀及忧患心理,也成为作为休闲生活方式的一种表现。对于日常生活与信仰生活的复杂关系,匈牙利学者阿格妮·赫勒(Agnes Holler)进行了简明提示:“宗教总是日常生活的组织者,而且常常是它的主要组织者。从根本上说,是经济活动决定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但是,除此而外,正是宗教塑造了为生存需要所支配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①

基于此因,旧街镇花朝节庙会才能吸引大量的信徒,奠定自己的群众基础。赶会的群众怀着各自对新的一年生活的美好期望,借拜花神去庙里拜遍了要拜的菩萨,希望在新的一年的生活中得到如意。花朝节庙会带来的是花朝庙市的兴起,人们由单纯的拜祭活动开始了商品交易,当这种交易带来的经济利益时,更多的人利用这个庙会的市场来进行物质交流和生活用品的补充。庆福寺庙逐渐的衰落,但这没有影响花朝节庙会市场朝着繁荣的景象前进,花朝节庙会的宗教功能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它的世俗功能,物资交流,娱乐活动吸引着更多的参会群众。解放后,政府及时的引导,确定花朝庙会市场正式走向物质交流。花朝节庙会在发展中,由单纯的祭神拜神,发展为拜神佛与购物、娱乐并行,直至最后庆福寺的衰落群众祭祀神佛观念的淡化,购物,娱乐功能的强化,花朝节庙会的世俗功能日渐强大,转化为一个经济商贸交流的市场。

2、不失时机的转型

花朝节庙会这一传统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不失时机的转型是其能不断演进保持活力的重要因素。

花朝节庙会作为旧街镇大型节日民俗活动,带有强烈的地方化的特征,同时又有程式固定、封闭性文化的特征。随着时代的进步,花朝节庙会的旧内容、旧程式、旧的表演方式已经发生变化,在保留当地传统特色的同时,不断强化了花朝节的时代感,花朝节庙会的举办和兴盛从旧街大庙的庙会祭祀中脱离出来,与经贸活动结合日益紧密。随着社会商品经济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成为物质交流的盛会。这种经贸活动,借助地方的文化特色,借助文化的凝聚力,得以风风火火地开展起来。仅1985年,旧街花朝交流会,集会达10万人众,附近三、五里,可闻会上喧闹之声,交易品种繁多,摊贩货架数以百计,三天成交额达35万元。可见,花朝节庙会交流会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为使花朝节庙会的节日活动更加突出地方特色,加强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以旧街镇花朝节带动整个新洲区乃至武汉的经济发展,进一步宣传扩大新洲区

^① (匈)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oller):《日常生活》,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01页。



乃至武汉市的影响，繁荣经济，2003年新洲区政府在旧街正式举办了第一届花朝文化旅游节，并将会期顺延为五天，新洲区区政府和旧街镇镇政府利用各方面的宣传和管理在花朝节市场上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当然，旅游节并没有局限在旧街镇当地花朝节的游玩，农家乐踏青等项目上，在会场上，有专门的旅游展台介绍新洲区相关的旅游景点，并借旧街镇花朝节打出新洲旅游城市的定位“佛儒灵动、港城水都”如：道观河风景区、报恩禅寺、帝元乡村俱乐部、宋渡岛休闲度假区、阳逻山庄、阳逻水乡及汪集鸡汤、张店鱼面等旅游点，武汉市内各大小型旅行社积极开展以花朝节穿插的旅游线路。文化与旅游日益结合起来的主要方式不仅可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也给了经贸活动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艺开花，经济结果，这种经贸活动，给予旧街镇花朝节庙会在新时期发展注入了极大活力。



第四章 旧街花朝节庙会对乡村社会生活的影响

一、推动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

花朝节庙会期间正值农业生产中空闲期，春回大地，年节将尽的时刻，人们正好有时间外出参加庙会，为下一轮农业生产做好精神准备和心理准备。花朝节庙会是人们互换农业生产工具的主要场所。它以商品贸易的形式，展示了近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面貌，反映了社会分工的细密以及农民与市场联系的加强。这种贸易既方便了购买物资的民众，也方便了在花朝节描绘市场上寻找商机的民众。各地群众借此机会参加庙会，进行购买生产工具、物品交换、商品买卖和文化交流等活动。由于庙会的群众参与性很强，是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民众自发形成，又集中于一时一地举行，实属难得，民众借此机会互通有无，调济余缺，传递信息，进行经济、文化和技术交流等活动。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说，往往利用这个机会互换农业产品，购买农业生产上急需的农具，为下一轮农业生产做好准备。从农民自身角度来说，古时交通工具十分落后，山川阻隔，路途遥远，加上官府关卡重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农民专程出外购买农具的机会并不多，参加旧街花朝庙会则成了他们一年中为数不多的外出机会。待花朝庙会发展成熟后，市场的稳定吸引了不少来自边远山区的农民就利用赶庙会的机会，购买农业生产上急需的优质工具和原材料，有的农民还把自制的农具带来，用以交换自己需要的农具，这些都进一步推动了各地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花朝节庙会就成为民众互换农业生产工具的重要场所。

花朝节庙会的农事习俗活动对当地农业生产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笔者认为，花朝庙会与农业生产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庙会期间，商贾云集，民众买卖和交换物资频繁，促进了旧街镇乃至新洲区的农事习俗活动的进行，对当地农业生产影响较大。这些农事习俗活动反映出农作物生长的季节和周期性特点，既有人们长期在农业生产实践中经验的积累和总结，又有如何指导农业生产的手段和方法的体现，几乎涵盖着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对农业生产具有一定的指导和促进作用。

而随着传统农业的发展，手工业也随之兴盛起来。改革开放前，传统的手工农用生产工具在整个庙会市场占有很大比重。如适合一人一牛耕作的木犁、传统排灌农具水车；田间管理用的薅扒、板锄、秧扒、抓钩、耳耙、铁锹等；收获工具沙镰、草镰、铁钩、锄头、扒锄、铁锹、连枷、石碾、扬叉、木齿耙、木锨、风簸、簸箕、筛子刮板等；还有些日常生活所需的木船、划子、囤盆、扁担、冲担、绳索、水桶、粪桶、竹制的箩筐、菟箕、筲箕在市场上占很大比重。80年代后，随着机械化的普



及,传统农用生产工具减少了一些,如传统的水车和木犁已消失,但仍保留了一般耕作所需的农具,只是农产品的材质逐渐被铁器取代。目前花朝节庙会市场上售卖的手工产品,更多的是日常生活用品,如竹扫把,竹簸箕,木质粗糙简单的桌椅板凳家具用品。手工业产品市场的扩大刺激了当地手工业进一步发展,花朝节庙会市场给农业和手工业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空间,从而弥补了城市经济与集市贸易的不足,也加速了农产品商品化的进程,促进了近代农村的社会转型。

二、促进了乡镇经济的转型

花朝节庙会八百年的演变,也促进了旧街镇经济的转型。

鄂东区以前是以传统农业为主体的区域,农业社会和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花朝节庙会始终贯穿着为农的思想。解放前的群众自发赶会,是需要为春耕做准备,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明确、城镇观的形成,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农村土地使用政策经历了几次重大变革,农民对土地的占有欲望、依赖程度均发生了变化。农民群众不再拘于单纯的农业生产,对手工业,农副业增收投入了更多,平时农闲时候进行一些手工品的农特产品的制作,花朝节庙会这一固定的物资交流市场,为群众们投入这种热情有了保障。会期蜂拥赶会的群众的消费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当地工商业的发展。一些小商店商铺,也因为门店位置不错,在花朝节庙会期间生意兴隆。花朝节庙会固定的会期,固定的赶会商贩,固定的赶会群众,形成了固定的市场。这个庙会市场,又带动了旧街镇当地工商业的振兴,当地商店多分布在花朝节庙会会场,以其在花朝节庙会期间获得最好收益。会期前来赶会的外地商贩多是选择当地民宅临时租住,当地一些居民因此增加了经济收入。赶会群众和商贩的饮食消费也刺激着旧街镇餐饮业的扩大。现今,旧街镇有餐饮住宿的旅馆三个,餐馆六个和若干小吃摊。随着旅游业的开展,武汉市不少旅游公司推出的“花朝游”“城乡两日游”,沿着武汉途径阳逻山庄,汪集鸡汤、陶河板鸭也借势做了宣传,逛玩了旧街花朝,顺便去道观河风景区欣赏山水自然景观。花朝节的发展,促进了当地乡镇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三、活跃了乡村生活

旧街镇花朝节庙会为当地的群众承担起这一娱乐功能,极大的活跃了乡村生活。花朝节庙会,它是平日单调生活、辛勤劳作的调节器,是传统礼教束缚下人们被压抑心理的安全阀,这种调节器和安全阀使乡村社会运转得更加和谐、稳定。群



众平时的默默劳作，需要节日作为一年辛勤的补充甚至报答和期望。这种心理在终日劳作的农民群众中更是普遍，他们希望用这种节日的欢聚来弥补个体的孤单感，用节日的丰实的物质生活作为对平时较为单调生活的补偿，而节期的休息暇闲则是对平时忙碌的补偿。而且，它的娱人功能最初是由娱神功能转变过来的，众所周知，农民群众的娱乐消遣活动少得可怜，但在娱神的过程中，人却能从中得到快乐、放松，所以，花朝庙会的娱人功能也很快地固定下来了。在花朝节中，不论是充斥市场上的耍猴耍把戏的圈子，马戏歌舞或者楚剧，乃至街上人挤人的吆喝声都是人们自我享受这场盛会的方式。平时再拘谨的小伙，到了这摩肩擦踵的时刻，也会自觉去挤一把，感受花朝的氛围。而人们津津乐道的庙会戏则可以让他们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回味无穷，无论是台上的精彩和台下的拥挤和热闹，抑或是路边的小吃的美味，或者挤掉的鞋子的尴尬都变得其乐无穷，让他们沉浸在其中热切期盼来年花朝节的到来。

四、和谐了人际关系

庙会传统乡村重要的休闲方式之一，近世仍然如此。庙会期间，社区间的往来陡然频繁，空间距离的缩短，亲属关系自然加强。庙会活动(如庙戏等)本身给人们带来的娱悦自不必说，就是其间发生的花絮新闻，大量而快捷的信息传递就让群众兴奋不已。花朝节庙会活动大大和谐了民众的人际关系。一般说来，乡村社会在社会关系上表现出“孤立和隔膜”状态：“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但花朝节庙会的存在使得当地社区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①，当地村民实际的社会生活图景显得更为丰富。在花朝节庙会期间，乡民流动频繁，在买卖中交流感情，传递农耕及日常生活经验，亲朋好友的聚集，妇女闲话家常，在狭小的空间徒增了许多感情，乡民的距离也得到拉近。

^①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9页。



结 语

花朝节是重要的民间传统节日，花朝节庙会是集宗教、贸易等于一体的民间习俗。新洲区旧街镇花朝节庙会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历经几百年的发展从未间断，成为当地及附近居民的一大重要物资交流市场，在湖北地区有较大影响。从旧街花朝节庙会八百年发展演变的历史，看庙会与乡村社会生活的互动，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旧街镇作为山区与平原交界处，靠近武汉、毗邻豫皖的独特条件为花朝节庙会在地兴起产生提供了便利的地域条件，传统的农业经济特点又促进了花朝节庙会的发展；当地花朝节与庆福寺庙会结合并不断演变，解放后在政府引导下发展为花朝物资交流会，在改革开放后一度十分繁荣，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新洲区政府借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引导花朝物资交流会向花朝旅游文化旅游节转型，演变成为以文化旅游为特色的多功能的宗教、文化、经济活动，对新洲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旧街镇花朝节庙会长盛不衰的原因，是因其以多重功能为源泉，而民间与政府互动成为它发展演变的保证，花朝节庙会自身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演进，由花朝节庙会转型为物资交流会再转型为文化旅游节给它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旧街花朝节庙会历经几百年的发展，对乡村社会生活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推动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乡镇经济由传统农业向农副业——工商业——旅游业的转型，活跃了平淡的乡村生活，和谐了人际关系，不仅如此，这一庙会在推动当地社会生活及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周边区域农村经济的发展。

花朝节庙会得以在八百年不间断的流传发展，是因为花朝节庙会市场成为当地村民及附近群众日常经济的重要补充，花朝节庙会的存在，不仅满足当地群众民众的购买需要，也提供给民众难得的旅游休闲机会，更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当然，我们要认识到，旧街镇花朝节庙会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于民俗与庙会物资交流这样的物质文化的结合，得以长盛不衰，这一事实告诉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起来后，还需要开发好，利用好它，传统文化只有与现实生活相结合才有生命力。旧街镇花朝节庙会虽然被纳入到武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但是它的独特性还没有被充分挖掘，只有鲜明的富有地方文化的物质支撑，才能显示出旧街镇花朝节庙会的特点。花朝节庙会在不断的演变中得以流传发展，以参会群众的利益为最大目标，结合现实不断转变，无论是经济，文化，娱乐都满足了乡村群众的需要，才保证了花朝节庙会发展的生命力。旧街镇花朝节由最初的花朝庙会发展到物质交流会至如今的旅游文化节，这得益于当地政府的积极宣传和引导，当地群众



的积极配合，使它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演变，充满着生命力。旧街镇花朝节庙会的流传发展蕴涵着丰富的经济意义与社会文化意义，使它在当地成为一种民俗习惯，成为一种节日的文化。



参考文献

（一）文献资料：

- 《乾隆黄冈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卷十六。
- 《乾隆黄冈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卷十七。
- 新洲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编：《新洲县供销社志》，1987 年。
- 赵步云、洪泽民：《旧街镇志》，1987 年。
- 李华树、赵步云、洪泽民：《新洲旧街的花朝会》，武汉《春秋》1987 年第 5 期。
- 政协新洲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新洲文史资料》（第一辑）1988 年。
- 宗懔：《荆楚岁时记》，中华书局 1991 年。
- 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
- 新洲县志编纂委员会：《新洲县志》，武汉出版社 1992 年。
- 赵步云：《琴剑诗词集》，新洲诗社 1994 年。
- 陈和润、汪厚川：《新洲风情录》，武汉出版社 1994 年。
- 政协新洲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新洲文史资料》（第三辑）1995 年。
-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北省志·民俗》，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 政协武汉市新洲区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新洲文史资料》（第四辑）1998 年。
- 万勇、付明星：《新洲历史新篇章》，武汉市华新印刷厂 2002 年。
- 李华树、林进：《旧街庙志》，旧街街志办公室 2002 年。
- 王俊奇：《花朝节（文化史海拾零）》，《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 年 03 月 25 日第 7 版。
- 丁福昌：《杭州古老的花朝节》，《交通旅游导报》2005 年 3 月 10 日第 10 版。
- 武汉市新洲区党史地方志办公室编：《新洲风物采珍》2006 年。
- 《旧街花朝节：现代版“清明上河图”》，《湖北日报》2007 年 4 月 3 日第 3 版。
- 《植被·根脉》，《武汉文史资料》2008 年第 3 期。

（二）著作：

- 冯尔康等：《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8 年。
- 顾颉刚：《妙峰山》，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 年。
- （美）奥格本：《社会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 郭子升：《北京庙会旧俗》，中国华侨出版社 1989 年。



- 段玉明：《寺庙与中国文化》，三环出版社 1990 年。
- (日)直江广治：《中国民俗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
- 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 1992。
- 段玉明：《西南寺庙文化》，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
- 高占祥：《论庙会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2 年。
- 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 徐剑艺：《中国人的乡土情结》，上海文化出版社 1993 年。
- 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上海民俗学会编：《中国民间文化》，学林出版社 1993 年。
- 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 刘宁波、常人春：《古都北京的民俗与旅游》，旅游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 郭子升：《市井风情——京城庙会与厂甸》，辽海出版社 1997 年。
- 严昌洪：《在商业革命的大潮中——中国近代商事习惯的变迁》，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 雷家宏：《中国古代的乡里生活》，商务印书馆 1997 年。
- 王兆祥、刘文智：《中国古代庙会》，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1997 年。
- 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 高有鹏：《中国庙会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 年。
- 牧雨，齐放：《消逝的风俗》，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年。
- 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
- 高有鹏：《沉重的祭典：中原古庙会文化分析》，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 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 ——“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 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沈阳出版社 2002 年。
-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年。
- 小田：《在神圣与凡俗之间——江南庙会论考》，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 萧放：《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中华书局 2002 年。
- 孙江：《事件，记忆，叙述》，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 (美)阿兰·邓迪斯著：《民俗解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 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年。



吴效群：《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常建华：《岁时节日里的中国》，中华书局 2006 年。

严昌洪：《20 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小田：《江南场景——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欧大年、侯杰、范丽珠主编：《保定地区庙会文化与民俗辑录》，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7 年。

高有鹏：《庙会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三）硕士学位论文：

李海荣：《北京妙峰山香会组织变迁研究》，首都师范大学 2005 年。

孙歆：《明清以来江南庙会与妇女生活》，苏州大学 2005 年。

刘霞：《明清时期山东庙会研究》，山东师范大学 2006 年。

孙跃中：《近代成都劝业会研究》，四川大学 2006 年。

谢永栋：《清代至民国山西平鲁的庙会与乡村社会》，山西大学 2007 年。

（四）期刊论文：

钱国旗：《佛教与中国岁时节日》，《民俗研究》季刊 1991 年第 3 期。

陈玉明：《邢台火神庙庙会》，《民俗研究》季刊 1991 年第 4 期。

聂凤峻、刘俊杰：《因势利导，发挥庙会的积极作用》，《民俗研究》季刊 1994 年第 1 期。

吉发涵：《庙会的由来及其发展演变》，《民俗研究》季刊 1994 年第 1 期。

吕继祥：《泰山庙会述论》，《民俗研究》季刊 1994 年第 1 期。

剑君：《曲阜林门古会》，《民俗研究》季刊 1994 年第 1 期。

朱君之、叶涛：《威海望岛仙姑庙与仙姑顶庙会考察记》，《民俗研究》季刊 1994 年第 1 期。

崔学礼：《临沂骡马大会》，《民俗研究》季刊 1994 年第 1 期。

马庚存：《青岛市区的庙会与山会》，《民俗研究》季刊 1994 年第 1 期。

吕伟达：《福山太平顶庙会》，《民俗研究》季刊 1994 年第 1 期。

王全宝：《费县龙王堂庙会》，《民俗研究》季刊 1994 年第 1 期。

滑天稽：《庙会·庙市·赶会》，《民俗研究》季刊 1994 年第 1 期。

赵世瑜：《明清时期江南庙会与华北庙会的几点比较》，《史学集刊》1995 年第 1 期。



高有鹏、孟芳：《简论庙会文化的基本功能与基本特征》，《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

高有鹏：《简论庙会文化的基本功能与基本特征》，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

赵世瑜：《中国传统庙会中的狂欢精神》，《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高有鹏：《中原民间庙会文化简论》，《民俗研究》季刊1996年第2期。

赵世瑜：《庙会与明清以来的城乡关系》，《清史研究》1997年第4期。

吴效群：《妙峰山：北京的香会组织及其“政治”活动》，《民俗研究》季刊1998年第2期。

小田：《“庙会”界说》，《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

小田：《近世江南庙会与社区民间权威》，《民族艺术》2001年第2期。

梁方：《庙会与武汉城市旅游经济》，《长江论坛》2001年第5期。

刘铁梁：《作为公共生活的乡村庙会》，《民间文化》2001年第1期。

梁方：《庙会及其现代转型》，《湖北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王晓莉：《妙峰山的茶棚》，《民俗研究》季刊2002年第1期。

詹娜：《辽东王姑祠庙会调查》，《民俗研究》季刊2002年第1期。

小田：《休闲生活节律与乡土社会本色——以近世江南庙会为案例的跨学科考察》，《史学月刊》2002年第10期。

小田：《近代江南庙会与农家经济生活》，《中国农史》2002年第2期。

[美]韩书瑞著，周福岩、吴效群译《北京妙峰山的进香之旅：宗教组织与圣地》，《民俗研究》季刊2003年第1期。

刘晓春：《非狂欢的庙会》，《民俗研究》季刊2003年第1期。

梁方：《城镇庙会及其擅变——以武汉地区庙会为个案分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3月第30卷第2期。

小田：《民间记忆方式与社群关系的成长——以一个江南乡村庙会为例案的跨学科考察》，《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岳永逸：《乡村庙会传统与村落社会》，《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李永菊：《明清女性参加庙会的文化需求分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梁方：《庙会的传承与社会化——以武汉地区为例》，《长江论坛》2004年第6期。

吴效群：《建构象征的“紫禁城”——近代北京民间香会妙峰山行香走会主题



之一》，《民俗研究》季刊 2005 年第 1 期。

张成福：《庙会重建中的文化生产——以妙峰山传说为分析个案》，《民俗研究》季刊 2005 年第 3 期。

刁统菊、李然：《庙会、传说与历史——对费县龙王堂庙会的调查与思考》，《民俗研究》季刊 2005 年第 4 期。

叶涛、任双霞：《泰山王母池九月九庙会调查报告》，《民俗研究》季刊 2005 年第 4 期。

徐斌：《香火庙：诉讼与械斗——以晚清黄冈县个案为例》，《武汉大学学报》2005 年第 2 期。

孙跃中：《从花会到劝业会——成都庙会文化的历史沿革》，《文史杂志》2005 年第 3 期。

小田：《庙市特征小议》，《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 年第 1 期。

秦燕、刘慧：《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西部农村的庙会文化关——以陕北地区为个案》，《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 年第 4 期。

谢永栋：《清至民初山西平鲁农村的庙会与女性——以平鲁城村为例》[J]，《沧桑》2006 年第 4 期。

曹荣、詹环蓉：《第十二届妙峰山传统春季庙会调查报告——旅游重塑下的妙峰山庙会》，《民俗研究》季刊 2007 年第 1 期。

李勋：《故乡的花朝节》，《湖北档案》2007 年第 4 期。

曹大明：《庙会变迁及其动因研究——以永兴汉三侯祠为例》，《长江论坛》2007 年第 6 期。



致 谢

学生时代的梦，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岁月席卷，我们却听到时间磨损的声音。似乎还能记得，开始的开始，走进桂子山来时那带点兴奋带点紧张的眼神。可在这最后的最后，在我们来不及喘息的伤感里，我们又不得不走了。记得新生报到，满校园的欢迎彩幅，迎风招展，军训的号角似乎还在耳边回响，浓郁的桂花香味还在空气中弥漫，一切依稀在目，恍如昨日，我们花掉了七年的时光终究还是走向告别。时光的年华中，我的身影，穿梭在那些画面中已数不清。在我记忆的坐标横轴上，是从七号楼到八号楼的奔波，是我曾流连的图书馆，是我最熟悉的一号楼，还有，我的宿舍小家，去过的食堂，日日晨读的电影场，团委的那条小路，光影斑驳下的玉兰苑；在我的记忆坐标纵轴上，是导师这么多年来对我的严格要求，悉心指导和关心爱护，是我和室友在考试通过后的欣慰而笑，是羽毛球场上与球友的拼杀，是我失意的时候好友一个温暖的肩膀。太多的，我无法忘记，太多的，我无法带走，太多的太多，随着毕业论文的定稿，走向离别。

从此挥别校园，告别迷茫青春，走向社会，踏上茫茫征程。早已褪去刚入校时的那份稚嫩，青春的脸上开始写满沧桑。也许这就是成长吧。这美丽的校园，留下太多关于青春梦想，关于奋斗的奇迹，关于迷惘和哀伤。离别之际，几多收获和憧憬，几多遗憾和感激。

在告别的日子里，我想传达给人们我的感恩之心。感谢我的大学，它永远是我精神上的导师，心灵中的母亲。感谢我的研究生指导老师严昌洪教授及师母给予的学术上的指引和生活中的关怀，我会铭记于心。

感谢我的父母，我的兄长，你们是我一生永远的最爱。感谢我的同们和朋友及室友：王本城、师萍萍、杨雪、王雅贞、王倩、曾芳、陈艳等，我们分享喜悦和哀愁，我们见证彼此的成长，共同经历青春期的迷茫，一起在挫折后变得坚强。生命中有你们的日子，一直都是美丽的。感谢一切的一切，所有的所有。

桂子山上的时光，让我明白：只有奋力和时间奔跑，才能追逐到自己最美好的时刻。